苏轼出守密徐湖时期的词作内容及地位

彭 文 良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摘 要：苏轼大量写词始于倅杭时期（1071-1074），成熟于贬谪黄州时期（1080-1084），出守密、徐、湖时期（1074-1079）是苏词发展的关键阶段：题材方面出现了明显世的俗化倾向，大量取材日常生活，内容得到充分的拓展；功能方面，倅杭时期还只是记录、记叙外部世界，而此期开始用词表达和表现真实的内心世界，包括政治事功之追求、对妻子之追怀与爱恋；就词风论，倅杭词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只流露了一些豪放与旷达的因素，而此期词作形成多种风格并存的局面，诞生了三大名篇，呈现初步成熟的三种词风。经历此期的充分发展，苏词才最终走向成熟。

关键词：苏轼；密徐湖时期；倅杭时期；词史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5-0121-04

我们知道苏词的大量创作始于倅杭时期（1071-1074），成熟于贬谪黄州时期（1080-1084），故出守密、徐、湖时期（1074-1079）则处于发端练笔到成熟凝定的关键阶段。此期间作词数量，以邹同庆的注本[1]为准，计52首：熙宁七年2首，熙宁八年6首，熙宁九年13首，熙宁十年10首①，元丰元年14首，元丰二年7首。从数量上看，此期历时五年所作与倅杭三年所作持平，而平均每年所作数量则低于前一时期。

密、徐、湖时期的苏词发生了突变，首先体现题材方面。倅杭时期的词作题材可分为纪行、酬赠、咏物、赠妓四类，这四类在此期都有，数量上分别为：纪行4首②，士大夫间的酬赠24首③，咏物3首④，赠妓3首⑤。除了此四类外，此期题材上出现一个新现象就是世俗化倾向很明显，大量取材日常生活。这又细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以苏轼自己的细思琐事入词，如《南乡子·自述》：

收稿日期：2016-04-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5YJC75103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106112015CDJSK47XK30）

作者简介：彭文良（1981-），男，土家族，重庆人，文学博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①其中《浣溪沙·荷花》（四面垂杨十里荷）与《临江仙·送王缄》（忘却成都来十载）二首，不作于此期，分参笔者论文《苏轼〈浣溪沙·荷花〉词编年新考》（《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苏轼〈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编年补证》（《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②分别是《望江南·超然台作》（春未老）、《临江仙·熙宁九年四月一日，同成伯、公谨辈赏藏春馆残花，密州邵家园也》（九十日春都过了）、《满江红·东武会流怀亭》（东武城南）、《永遇乐·徐州梦觉，北登燕子楼作》（明月如霜），前三首作于密州，后一首作于徐州。

③《减字木兰花·送东武令赵晦之》（贤哉令尹）、《减字木兰花·送赵令》（春光亭下）、《蝶恋花·密州冬夜文安国席上作》（帘外东风交雨霰）、《殢人娇·戏邦直》（别驾来时）、《满江红·正月十三日送文安国还朝》（天岂无情）、《何满子·密州作，寄益守冯当世》（见说岷峨凄怆）、《画堂春·寄子由》（柳花飞处麦摇波）、《江城子·东武雪中送客》（相逢不觉又初寒）、《阳关曲·答李公择》（济南春好雪初晴）、《浣溪沙》（傅粉郎君又粉奴）、《浣溪沙》（缥缈红妆照浅溪）、《水调歌头·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城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安石在东海）、《浣溪沙·赠闾丘朝议，时过徐州》（一别姑苏已四年）、《菩萨蛮·有寄》（城隅静女何人见）、《蝶恋花·暮春别李公择》（簌簌无风花自蹁）、《临江仙·送李公恕》（自古相从休务日）、《蝶恋花·送郑彦能还都下》（别酒劝君君一醉）、《阳关曲·赠张继愿》（受降城下紫髯郎）、《浣溪沙·彭门送梁左藏》（惟见眉间一点黄）、《南乡子·用韵和道辅》（未倦长卿游）、《江城子·恨别》（天涯流落思无穷）、《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减字木兰花·彭门留别》（玉觞无味）。

④《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寒雀满疏枝）、《洞仙歌·咏柳》（江南腊尽）、《雨中花·初至密州，以累岁旱蝗斋素累月，方春，牡丹盛开，遂不获一赏。至九月，忽开千叶一朵，雨中特为置酒，遂作此词》（今岁花时深院）。

⑤《殢人娇·王都尉席上赠侍人》（满院桃花）、《满庭芳·佳人》（香暖雕盘）、《南乡子·用前韵赠田叔通家舞鬟》（绣鞅玉钖游）。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凉簟碧纱厨。一枕清风昼睡余。卧听晚衙无一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

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若问使君才与术，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

《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

惭愧今年二麦丰。千畦细浪舞晴空。化工余力染夭红。

归去山公应倒载，阑街拍手笑儿童。甚时名作锦薰笼。

一首写公事之余的读书生活，一首写游园之际的诗酒生活，都是以点滴琐事入词。这在苏轼之前几乎没有，意味着苏词向日常生活的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

第二种情况以普通民众参与的一些生活习俗入词，主要是节序词。如《蝶恋花·密州上元》：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词中以上元为背景，分别写了钱塘、密州的不同民俗，这在苏轼之前也是几乎看不到的。除了上元外，还有中秋词《阳关曲·中秋作》（暮云收尽溢清寒）、重阳词《千秋岁·徐州重阳作》（浅霜侵绿）、七夕词《渔家傲·七夕》（皎皎牵牛河汉女），展现了不同节序的民俗情况。北宋中期以后节序词很发达，如黄庭坚有重阳词13首，七夕2首，晁补之除了上述节序外，还有有守岁词一首，这些都受苏词这种生活化倾向的影响。

第三种情况就是农村题材。苏轼此期没有躬耕经历，所写并不是自己的亲历生活，只是他眼中艺术化了农村生活，但这是前人从未涉及到的、后来也少有文人再问津的题材类型，所以向来为论者所注意。如《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

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喜不须呼。归家说与采桑姑。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老幼扶摧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簌簌衣巾莎枣花。村里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软草平落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此组词以其清新舒徐的笔触刻画了农村的优美生活，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都有其独到处，为苏轼在词史上赢得了重要地位："苏轼是位富有独创性的作家，他在徐州时期的词作又有新的开拓。词最初从民间产生，题材原很广泛，现存敦煌词就有不少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但这个题材到了文人词中几乎中断。苏轼却给予恢复并有所发展，成为文人词中第一个写农村题材的词人。"[2]（P39）

其次，此期词在功能上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杭州时期的词，具有代表性的是纪行与酬赠两类，其共同点就是具有记叙性质，真实反映了苏轼的是外部生活。密徐湖时期的词开始转向抒写内心情志，不再满足于只是记录而已。首先，苏轼在此期开始用词来展现在政治事功方面的心路历程。我们知道在倅杭时期，苏轼已经用诗全面深入地反映了时局及自己的心态，但在同期的词里还没有此方面之反映，直到此期才有表现，最早的当属《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溥溥。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此词作于熙宁七年十月间。本年九月告下，苏轼罢杭州通判，移知密州。该月离开杭州北上，准备绕道去济南探看苏辙，因为沿途耽误，最后直接从海州赴密州，遂在路途中以词为书，写下此词寄给苏辙。元好问评价此词"鄙俚浅近，叫呼衒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3]（P27），甚至认定非苏轼所作。元氏所论主要针对下阕"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数句，认为过于粗豪直露，殊不知此词乃写给其弟，本无意修饰，难免直率。其次，所谓“叫呼衒鬻”其实正真实反映了苏轼此时意气风发、欲有所为的雄心壮志。苏轼熙宁四年被迫离开汴京，内心难免很抑郁，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无论是新政，还是人事变动方面，都让苏轼看到一线希望；而九月由杭州通守而移知密州，由副职升任为行政长官，无疑让苏轼再次为之兴奋，遂产生“致君尧舜”的宏伟理想，完全在情理之中。至熙宁八年（1075）十月再出现《江城子·出猎》“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雄豪之作，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期心态除了初到密州时候的奋发有为外，中间还有徘徊犹豫，也体现在词中，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
>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如果说《沁园春》词中展现的全是希望的话，则此词是希望与彷徨交织。苏轼以“青天”“宫阙”指代神宗与朝廷，所谓“我欲乘风归去”，不是归隐，而是希望回到朝廷，其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兴奋。原因在熙宁九年丙辰（1076）前政局发生变化。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入相，新党内部发生倾轧，神宗对吕惠卿渐感失望，于是于熙宁八年二月再次起用王安石，继续推行新法。然新派内部的斗争仍在继续，邓绾与吕惠卿等相互告发，吕惠卿与曾巩等新派主将纷纷外放，王安石身边无可信之人，加上自然灾害严重，新法难以推行。王安石于熙宁九年七月上章求退，神宗也有意答应王安石的请求。总体上说，熙宁九年丙辰（1076）中秋前，新派的势力出现瓦解趋势，守旧派有机会重新回到权力中心，苏轼也感觉到归朝有望，所以在词中难抑激情。然而当时的政治斗争可谓波诡云谲，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实难预料。回想此前，自己为新派排挤，先后判官告院、任开封府推官，以及被谢景温诬陷[①]等，可以说旧伤犹在；新派内部的斗争能否在守旧派内部重演，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的际遇离合会不会在苏轼身上发生，这些无不令苏轼对朝廷充满疑虑与恐惧。所以当苏轼刚想“乘风归去”之际，随即谋生“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忧虑，甚而转念一想，觉得还是在“人间”“起舞弄清影”自由。所以该词展现的就是此期矛盾、微妙的心情。至熙宁十年（1077）中秋再作同调则情况大变。《水调歌头·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城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

>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
>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词中以谢安相许，既企慕其有经济天下、大展鸿才之机会，又推许其功成名遂、急流勇退之雅志。然与前二词相比，已无进取之意，倒多了几分消沉气息，从下阕追求醉酒忘忧而否定刘备卧百尺高楼之大志可知。苏轼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心态变化亦与时局紧密相连：王安石于熙宁九年十月第二次罢相之际，在密州即将任满的苏轼满心以为可以回到朝廷，所以在《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中流露出希望与激情；然次年初告下，再次移知徐州，无疑让苏轼感觉到希望落空，于是有了退隐之意。可以说此三首词折射了此期苏轼在政治上的追求、动摇、退缩之全过程，这是倅杭词所没有的。

苏轼此期除了用词来言志外，还用词来抒情，代表作就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
>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劾，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询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坐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巧抑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此词乃悼首任妻子王弗。王弗治平二年(1065)在汴京病逝,至熙宁八年乙卯(1075)刚好十年。这是“妻子”形象首次进入苏词,也是首次出现在词史中,以其真实和深刻的抒情影响着后来的词史发展,其意义在后文还将有分析,此处从略。

从词体功能上看,倅杭时期还只是记录、记叙外部世界,而此期开始用词表达和表现真实的内心世界,包括政治事功之追求、对妻子之追怀与爱恋。如果说倅杭时期词的特点是真实的话,此期词的特点就是深刻与自我,即村山哲见所说的有“个性”:“熙宁七年秋离开杭州……而开始发挥自己坚强的个性。”[4](P264)正是这种“个性”使得苏词与前代词呈现出明显的区别,可以说词作为心绪文学的主要属性,就苏轼而言,是在此期才开始形成。

其三,苏轼独具特色的词风形于此期。倅杭词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只流露了一些豪放与旷达的因素,而此期内词作形成多种风格并存的局面。此期诞生了三大名篇,分别代表了初步成熟的三种词风:《江城子·出猎》如其词所言,有“千骑卷平冈”之势,是豪放词风的代表;《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亦如其词所言“凄凉”“断肠”,是婉约词的代表;《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下阕自我慰藉,纾解其中的张力,是旷达词风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此三词皆写于密州时期,若作深究,豪放应该是此期的主导风格,从数量上看此类词是最多的,除《江城子·出猎》《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外,如《减字木兰花·送东武令赵晦之》(贤哉令尹)、《减字木兰花·送赵令》(春光亭下)等词都有豪放因素。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很强调密州时期的词风形成意义,如王水照先生就说:“苏轼密州时期的词作,标志着豪放词风的初步成熟,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2](P36)

另外,此期词由于题材的拓展、内容的丰富,词的容量也相应扩大,此期开始出现慢词。除前面提到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水调歌头·余去岁在东武……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外,尚有《满江红·正月十三日送文安国还朝》《满江红·东武会流杯亭》《满江红·佳人》《永遇乐·徐州梦觉,北登燕子楼作》,计7首长调。

简言之,此期是苏词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自熙宁八年乙卯(1075)至元丰二年己未(1079)……此五年乃东坡词之自觉期与成熟期,正是在此期内,东坡完成了由‘别是一家’到‘自成一家’之转变,此后之东坡词才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自家面貌。”“作为内心矛盾的具体表现,则是东坡豪放词居于主导地位,旷达沉郁词亦开始出现,婉约词也与前大异其趣,变得更加深沉典雅。这是东坡沿着“以诗为词”之途径将词由‘共我’引向‘自我’,由‘代言’引向‘言志’的胜利实践,是将词由‘别是一家’引向‘自是一家’的最后完成”[5](P40),意味着苏词正在转变为自我陶写的工具,黄州词的最终成熟,正是延续并深化此期词作发展的结果。

———————

参考文献:

[1]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 王水照.苏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 [金]元好问著,姚奠中编校.元好问全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 [日]村山哲见著.唐五代北宋词研究[M].杨铁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5] 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Themes and Position of the Ci-poems Composed by Su Shi from 1074 to 1079

PENG Wen-liang

(Higher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years from 1074 to 1079 in Mizhou, Xuzhou and Huzhou was the key period of Su Shi's composition of ci-poems, whose themes tended to be secular and draw materials from ordinary life, with the content enriched. Rather than record the outside world, these poems expressed his real inner world, including his political pursuits and reminiscence and love of his wife. They gradually formed three styles, and became mature.

Key words: Su Shi; serving in Mizhou, Xuzhou and Huzhou from 1074 to 1079; position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